

民生与执政资源开发研究

MINSHENG YU ZHIZHENG ZIYUAN KAIFA YANJIU

赵中源◎著



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生视野下的党的
执政资源开发研究”（09YJA710012）最终成果

民生与执政资源开发研究

MINSHENG YU ZHIZHENG ZIYUAN KAIFA YANJIU

赵中源◎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生与执政资源开发研究 / 赵中源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01 - 013852 - 7

I. ①民… II. ①赵… III. ①人民生活—研究—中国②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IV. ①D669. 3②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2897 号

民生与执政资源开发研究

MINSHENG YU ZHIZHENG ZIYUAN KAIFA YANJIU

赵中源著

责任编辑 车金凤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 编 100706

网 址 [http://www. peoplepress. 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13852 - 7

定 价 56.00 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近年来,执政资源问题与当代中国民生问题都是学术界和全社会的关注热点。执政资源研究一般侧重于政治学领域,而民生问题研究则集中于社会学界。这两个问题研究现状的相关述评并不少见。国内关于执政资源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著述的引入,而引起广泛关注与研究是在2004年“执政资源”被纳入党的“执政七论”之后,可以说是历时甚久。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如对执政资源要素界定的依据或标准、执政资源的体系架构及其运行规律等问题仍缺乏共识,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执政资源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将这些问题厘清之后,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构成要素、现状评价,以及有效开发路径探讨等才有据可凭,而这又涉及另一些重要的问题,如执政资源状态评价的指标体系如何建构,以什么为依据,各要素在执政资源体系中的定位与相互关系等,这些问题需要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统计学、运筹学等学科的共同支撑。

民生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学范畴,民生与民生问题并非同一概念,因此不能混为一谈。民生构成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内容,主要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及其可能的发展预期。而民生问题则是民生现实状态与民生应有预期之间的差距所引发的相关问题与矛盾,是社会价值和利益分配未能协调一致的非和谐状态。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止境,民生问题也就没有终点,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从政治学视角来看,在我国社会资源动员模式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背景下,民生问题就不是简单或纯粹的经济性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的、环境的、政策性的乃至个体的因素都能诱发民生问题,因此,解决民生问题没有固定模式与套路,需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这就需要执政党与政府层面的宏观运筹与整体推进,否则就可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难以有长效。做到

这一点,就需要对民生问题的政治学意义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即对民生与执政的关联性作出明确判断。从可见的文献看,现阶段关于我国民生的研究实际主要集中在“民生问题”的描述,以及对国家现行民生政策及实践的解读层面,当然这些问题不可谓不重要,但仅停留于这一层面显然也是不够的。

从民生的视角研究执政资源开发问题,是一个基于时代特点与要求的选题,既扩大了执政资源研究的内涵与疆域,也拓宽和提升了民生研究的视野与层次,因应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

本书分为五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了围绕民生开发执政资源的基本逻辑,以及对国内学界关于执政资源与民生两大问题研究的评述;第二章着重解读民生与现阶段中国民生问题,在对两个概念加以甄别的基础上,对民生理论的渊源与演进、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形成与内涵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与此同时,对现阶段中国民生问题加以描述与剖析;第三部分主要在系统解读执政资源的构成及各要素的基本功能与内在关系的基础上,阐释了民生与执政资源开发的逻辑关联性,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开发的历史实践,旨在阐明围绕民生开发执政资源的逻辑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第四章着重阐述如何立足时代特征与中国国情、党情、社情,探析围绕民生开发执政资源的有效途径,这也是本书的现实意义所在;第五章则立足国际视野,探寻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以建设福利国家、人权社会、价值认同等路径,开发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可取做法,为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有效改善民生与开发执政资源提供借鉴。

本书的初稿完成于2012年年底,并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结题成果送审并通过,但苦于对一些问题的阐述缺乏底气,因此一直处于修改之中,在此期间,国家关于民生的认识与实践在不断演进,一些提法和做法也在不断发展与更新,所以,对于该书的定稿始终惶惶然。民生未有止境,围绕民生开发执政资源未有终点,研究仍需继续努力。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 1

第一章 绪 论 / 1

- 一、民生与执政资源问题的提出 / 1
- 二、关于民生与执政资源若干问题的研究 / 6

第二章 民生与现阶段“民生问题” / 24

- 一、民生与民生问题的基本解读 / 24
- 二、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溯源与发展 / 47
- 三、我国民生问题现状与评析 / 63
- 四、现阶段社会心理弱势化值得关注 / 81

第三章 民生与党的执政资源开发 / 92

- 一、党的执政资源的基本构成 / 92
- 二、执政资源体系的内在关系 / 131
- 三、民生关联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得失 / 135
- 四、党开发合法性资源的轨迹与取向 / 142

第四章 围绕民生开发党的执政资源的路径 / 161

一、民生幸福是党执政的基本价值取向 / 161

二、围绕民生开发执政资源的基本路径 / 174

三、现阶段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基本关系 / 200

第五章 发达国家社会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 218

一、提升国家福利,保障社会基本民生 / 220

二、推进社会民主,倡导公民广泛参与 / 230

三、尊重基本人权,维护个体合法权益 / 243

四、注重文化培育,提升国民价值认同 / 254

参考文献 / 264

后 记 / 274

第一章 绪 论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政治集团要取得并巩固执政地位,都需要相应的执政资源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是政治运行的一种内在规定。执政资源的构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资源要素在体系中的定位及能效不尽相同,其涨消变迁直接制约着执政资源体系的运行状态。学术界对于合法性资源(即民心资源)是执政资源中的核心资源,直接决定着执政资源得失这一基本观点从来不存异议,这就契合了“民心向背定兴亡”的历史定律。“利益决定立场”,民心显然从执政党对待民生的态度与改善民生的成效中来,这就是“民生决定民心”的基本逻辑。

一、民生与执政资源问题的提出

古往今来,民生始终维系着百姓生存发展,牵连着民心民意,因而也就与政权兴衰休戚相关。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民生状态往往可能成为一个政权兴衰的风向标。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政治集团无论是通过暴力革命抑或在选举博弈中脱颖而出,取得执政地位,都需要相应的资源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样,取得执政地位的政治集团,无论是为一家之私的封建专制政权,还是为一党之私的资产阶级政党,抑或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执政的动机和目的大相径庭,但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把维系自身政权的稳定作为执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因此,在执政实践中一方面不断地巩固既有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利用所掌握的社会公权,不遗余力地发掘新的资源增长点,不断壮大和优化自身执政的资本。这些资源或者资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执政资源。顾名思义,执政资源就是支持政治集团取得并巩固执政地位,履行执政使命,提升执政效能,实现执政目标的各种有利因素的总和。

关于执政资源的要素构成,近年来学术界有多种解读,但其基本内核是一

致的,那就是合法性资源是执政资源中的核心资源,直接决定着其他执政资源要素的得失。“合法性”(legitimacy),是社会公众对特定政治系统的评价,国内的一些学者称其为“正当性”,其含义就是公正性(rightfulness)或合理性。目前通行的解释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①。合法性是“政治场域”中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执政党、一切政治和社会团体以及普通民众都自觉不自觉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民众认同度越高,执政党与民众的互动与默契度就越高,执政效能就会相应攀升,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也就越丰富。而这种民众认同既不是迫于强权的一种屈从,也非特定政治生态下对权威的盲从,而是经过理性过滤之后的一种由衷拥护与自觉跟从,即对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包括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和政绩认同。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态下,这种认同的外在一般表现形式是选票,而内在的表现形式则是社会心理的趋向,这种心理趋向从浅的层面上说可以是一种坊间口碑,从深的层面讲就是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社会公信力。换句话说就是民心向背问题。“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民众认同不可能是空穴来风,也难以始终如一,关键在于执政党的执政动机是否符合时代潮流,执政方式是否符合政权运行规律,执政绩效是否满足民众的生存与发展需求。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不同阶层的民众对民生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追求,因此就整个社会而言,民生的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尽管如此,社会公众却对一个社会的整体民生改善与发展状况有着基本趋同的感受与判断,而这一点恰恰是民众对执政党态度的决定性要素。一个长期无法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与尊严需求的政府,其执政的合法性必然会随着这一状态延续的时长呈反向运动。“政府存在的理论基础,决定其权威施用的合法范围,以及人民服从与忠诚政府的幅度,就取决于其能否满足人民的需要。”^②这就把民生与执政资源开发二者紧密结合在了一起。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尤其是我国社会进入整体小康之后,民生这一发展着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相应地不断充实和扩张,民众对自身生活状态和未来发展也有了更多的憧憬。民生不再像过去那样

①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② BAY C. Needs, “Wan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68(9): 241.

仅仅体现为衣食住行等民众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而上升为一种呼应时代发展的生活形态、社会生态、人权与国民尊严等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民生也由具体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上升为一种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等相交织的复合型问题。正因为如此,一个国家的民生的状态便对执政党的评价与公信力,以及由此延伸的民心趋向产生着更大的影响力,乃至规定性作用。

民生决定民心。这就决定了民生问题与生俱来的政治属性。民生和民生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民生构成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内容,也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组织活动的重要目的。而本书所指的民生问题则是民生现实状态与民生应有预期之间的差距所引发的相关问题与矛盾,是社会价值和利益分配未能协调一致的非和谐状态。政治学是以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政治过程或人类的政治实践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而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特定的主体(个人、团体或组织)为实现既定的利益目标,通过支配、影响、获取和运用公共权力而做出公共决策以及分配社会价值和利益的过程。^① 因此,从政治学视角来看,在我国社会资源动员模式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背景下,民生问题就不是简单或纯粹的经济性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②

其一,民生问题关联着社会制度的本质属性。在社会治理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还是以公平正义作为逻辑起点,这决定着一个执政党的政治属性,同时也反映着其所建构和奉行的社会制度的本质。公平正义是人类孜孜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反映着无产阶级执政党执政的价值取向和执政能力的高低。就一个社会的整体民生状态而言,公平正义既是民生改善的有力保障,也是最佳的民生状态。因为对普通民众而言,衣食住行、就医教育等具象的民生要素不可或缺,它是个体生存发展和社会有效运行的基本物质基础。众所周知,物质的追求是永远没有止境的,物质生活状态的改善并不必然带来民生幸福指数的提升。而需要精神层面的东西的共同作用,抽象的心理感受往往更影响一个人对自身和社会生活状态的评价。一般而言,个人和群体的幸福感往往更多地取决于其在一定社会环境中获得的社会认可和尊重的程度,与此相对应,不幸福则来自其在所处社会环境中的比较落差。一个人、一

① 陈振明:《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7页。

② 曹文宏:《民生问题的政治学解读:一种民生政治观》,《唯实》2008年第2期。

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群体或阶层,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其物质境遇的正向改善在正常情况下往往是一种必然。从理论上说,这种改善伴随着相应社会主体自身实现的满足与社会地位的提升,其对所处社会的正向评价也会相应增大。但如果这种改善仍然滞后于其所处社会生活整体发展水平,相对差距反而越拉越大,该主体的相对被剥夺感与社会失落感等就会自然滋生,那么这种自身的纵向改善带来的就不再是该社会主体尊严的提升,而意味其社会地位的进一步弱势化与边缘化,那么其对所处社会的评价,尤其是执政党的评价就会趋于负面。因此,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就显得十分重要。它不仅是最大限度保障民众合理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并以此改善和提升社会整体民生水平的前提,同时也是民众个体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并赢得自身尊严的重要来源。而这种物质与精神上的满足感自然会转化为民众对现存社会制度的认同与赞誉,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就会相应增加。由此可见,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现代民生的重要内涵。这也是经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党和政府越来越把以改善民生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以高度重视的原因所在。

其二,民生问题凸显党的执政理念与政府执政能力。执政理念是指建立在对执政规律认识基础上的执政宗旨和指导思想,是关于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和怎样执政的理性认识,是用以指导执政活动的根本原则。执政理念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为什么执政,也就是执政的宗旨、目的和价值追求;二是怎样执政,也就是为实现执政的宗旨、目的和价值追求而选择的路径、方略和基本方式。执政能力即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能力。执政理念决定着执政党的民生观,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势必将民生幸福作为执政活动的源动力和落脚点,因此能否有效改善民生,构建和谐幸福的社会生态,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意识和执政能力。在中国语境下的执政能力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协调各项建设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的能力。这些能力对应着现阶段党和政府工作的各个主要方面,但其最终的目标指向在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彰显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而全面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因此,其民生

意义显而易见。随着国家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供需矛盾突出、社会政策与公平正义不尽完善等方面的民生问题越来越突出地呈现在党和政府面前。能不能妥善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中所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处理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各项民生问题,建构合理的社会利益格局,使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分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对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同时,也是对执政理念的坚定性与执政能力的时代性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从民生具体操作层面而言,在于党和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建构解决民生问题的公共服务机制。

众所周知,我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正处在从整体小康向全面小康的过渡、社会生态正处于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坚守和实践党的执政理念,必须高度关注时代所催生的各种民生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而要实现这些公共需求的有效供给,需要尽快建立完善社会的公共服务体制,这是现阶段有效解决社会一系列问题和矛盾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必然孕育出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我们包容了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就意味着我们也必须包容这些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并通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不断完善社会政策,保障这些利益群体合法利益的有序实现。利益诉求的实现,对诉求主体而言就是一种民生的改善。这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行为和能力得到民众的认可的最有效途径。从这个层面上说,政府围绕改善民生提高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以及对这些产品和服务的配置合理性,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

其三,民生取向的政治合法性。伴随着现代政治文明的推进,当一个国家和社会去除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平稳健康发展之后,民生政治便成为执政党的一种理性选择。所谓民生政治就是以改善民生为政治目标,以民生问题作为政治决策、政治职能和政治资源配置的重心,以民众幸福指数作为考量政治发展标杆的政治模式。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生成的主要要素有:执政绩效的递增、治国方略的科学、执政党自身的先进性、制度设计的合理、公平正义的彰显等。在民生政治模式下,上述各种政治合法性要素的相互作用,保障和助推着社会的良性运转,处于该社会环境之中的民众生活质

量便会相应提高,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便会不断生成和富集。

“一个政府或一个政党要获得合法性需要:存在于一定的时间,有良好的政绩,人们愿意服从。”^①良好的政绩首先来自国民经济持续稳步增长,这是改善民生的基本物质保障,当然,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与民生的改善成正比,而只有当执政党将经济发展成果运用于改善民生,提升社会福祉,让普通民众收获经济发展的现实利益,经济发展才与民生挂起钩来。而民生改善会相应使执政党的政绩得以确立,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也会相应增加,这样经济发展成就通过改善民生这一环节便转化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如果离开经济持续发展这一物质基础,改善民生便失去物质基础,而只能停留在理论宣传与空洞说教之上,甚至演变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久而久之,便失去对民众的感染力。因此,改善民生,首先需要以发展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加强社会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与落实,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则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具体体现。执政党保持良好的执政绩效,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和认同就会不断产生共振效应,从而使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更加厚实。

二、关于民生与执政资源若干问题的研究

(一) 关于执政资源若干问题的研究

1. 党的执政资源问题研究的基本脉络和现状

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党的执政资源问题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该问题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中后期西方兴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十多年时间里,一些行为主义政治学著述被译介到国内,如1987年由王沪宁等翻译的罗伯特·A. 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曹沛霖等翻译的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马殿君翻译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等。国内学术界对资源政治学研究较早的有王沪宁、王邦佐等专家。随着研究的深化,政治资源问题的研究逐步演化为执政资源问题的研究,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执政资源问题研究的论文最

^① 参见迈克尔·罗斯金:《政治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早见于2002年,如《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发表的陈小林所写的《构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战略》一文、《党建与人才》2002年第3期发表的张立华所写的《对拓宽新时期执政资源的思考》一文等。需要指出的是,国内最早使用“执政资源”这一词汇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毛仲伟教授,1987年他在论及台湾政党合作走向一文中提出:“在野党可以采用政党合作方式分享执政资源……”^①但该文未对执政资源概念进行具体阐释。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资源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到,“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②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③毛泽东所说的“还不够”的东西、邓小平所说的“手头东西”,其实指的就是执政资源,但他们并未使用执政资源这一概念。胡锦涛在这一方面的探索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2004年6月,胡锦涛第一次将执政资源作为党的执政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提出来,其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近年来,该问题的研究引起了党内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从总体上看,这一问题仍是一个亟待深化的重大问题,主要表现为:涉及某个角度和方面的研究较多,全面系统的研究较少;应景性的研究较多,从学理角度进行深入研究较少;模仿性的重复论述较多,有见地的拓展性研究较少;从政治学角度研究的较多,利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较少;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较多,注重实证研究的较少。

2. 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相关观点

执政资源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概念的阐释、内涵的解读、要素的确立及基本架构等方面。

关于对执政资源概念的阐释,目前主要有五种观点:其一,财富说。如陈小林认为,所谓“执政资源”是指执政党在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中可调动和利用的财富。^④其二,元素说。如齐卫平认为,执政资源是执政党在领导国家的政治、

① 毛仲伟:《台湾政党合作走向浅析》,《台声》1997年第3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④ 陈小林:《中国共产党开发执政资源问题研究》,《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可供利用的支撑元素。^①其三,总称说。如吴文勤等认为,执政资源是指执政所依赖的各种资源的总称。^②其四,等同说。如黄明哲认为,党的执政资源主要是指执政的政治资源。^③其五,总和说。如谭吉华认为,执政资源是为完成执政使命可资利用的人、财、物、信息等自然的、社会因素的总和。^④这一观点之后被其他研究者逐步完善,目前通行的“总和说”表述为,执政党为履行执政使命、提高执政效能、实现执政目标、巩固执政地位可资利用的各种有利条件和要素的总和。上述概括的区别主要源于视角的差别,其着眼点有的是执政活动过程,有的是执政资源的构成,还有的是资源使用的目的。“总和说”之所以较为普遍地被认同,则是因为它首先比较清楚地阐释了执政主体的需求,即执政党执政需要的资源是有利于执政实践的、能够被开发利用的因素和条件;其次,回答了执政资源的作用指向,即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服务;再次,说明了执政资源是多要素的、现实存在的、可以被开发利用的因素和条件。

关于执政资源的内涵界定和组成方式问题,目前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1)多元并列说。即把某几种或某几类资源要素平行并列为党的执政资源。但究竟具体由哪几种或哪几类资源要素组成却存在多种观点。具体有几种说法。二元说,认为执政资源由政治资源和思想文化资源构成。三元说,认为应由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构成,或是将其分为权力资源、组织资源和思想文化资源。还有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划分,等。四元说,认为应包括先进性资源、体制性资源、合法性资源、民心性资源;或是将党的执政资源分为思想理论、政治权力、人才组织和历史经验四要素;还有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的划分;以及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军事资源的划分等。五元说,将党的执政资源划分为理论、组织、制度、权威、人才五个方面。六元说,认为执政资源应包含政治资源、制度资源、群众资源、组织资源、人才资源、精神资源;或是认为阶级与社会、党员与组织、理论与信念、章程与制度、人才与政治家、权威与民主六个方面要素构成执政资源。七元

① 齐卫平:《有效运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党政论坛》2002年第5期。

② 吴文勤、杨长鑫:《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变迁及其制度整合》,《理论参考》2004年第8期。

③ 黄明哲:《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的思考》,《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④ 谭吉华:《执政党扩充执政资源初探》,《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3期。

说,将执政资源划分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思想、组织、制度、物质、权力、历史七要素。十元说,则把历史、理论、权力、经济、社会、政策、文化、组织、制度、能力列为执政资源十要素。

(2)体系说。即认为执政资源是由多种要素按照一定的法则构成的一个复杂的体系。如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和运行性资源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执政资源的体系,或是将其分为党自身所拥有的执政资源和党在执政活动中产生的资源两大部分,或是认为经济基础资源系统、上层建筑资源系统、民心民意资源系统构成执政资源体系,或是将执政资源分为三类:基础性资源(权力资源、法理资源、体制资源等)、运行性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思想文化资源等)和保障性资源(先进性资源、认同性资源等)。

(3)一元决定说。即认为执政资源是由某一种或某一类资源要素决定的。如有学者认为,党的执政资源主要是指执政的政治资源。还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关键在于自觉地维护开发和扩充合法性资源。

(4)其他说。即按照执政资源的归属把执政资源分为党内资源与党外资源、国内资源与国外资源、体制内资源与体制外资源,或者按时间段把执政资源分为历史的资源和现实拥有的资源等。

关于执政资源的内涵及其构成方式问题的分歧,是目前制约执政资源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取得突破的瓶颈。这一现象对于一个前沿性课题的研究而言是正常的。笔者认为,把执政资源简单地理解为某几种或几类资源要素的平行并列的观点无法阐释各资源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相比之下,体系说更为科学。从广义上说,执政资源是一个构成复杂的庞大体系,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要素,体系中各要素虽然生成渠道、运行模式、作用方向及耗费方式各不相同,但却始终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并始终伴随着执政环境的变化而涨消变迁。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旧有元素不断流失、退化或被替代,一些新的资源不断生成和日渐富集,整个系统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而我们所指的是狭义的执政资源,也就是不可或缺的主干性资源。根据执政资源要素的运行方式和功能特点,将执政资源分解为基础性资源、运行性资源和保障性资源三类是恰当的,基础性资源笼统地说就是执政党的先进行资源,具体可以细化为意识形态资源、组织资源、阶级基础资源和历史资源等要素;运行性资源由权力资源、体制资源两大要素组成,权力是内核,体制是权力的配置与运行架构设计,换句

话说就是执政集团所设计的权力资源发挥社会治理作用的游戏规则；保障性资源主要是指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在历经多年研究之后，笔者认为，将执政资源直接表述为执政党的先进性资源、权力资源、合法性资源更为贴切。

需要指出的是，将经济业绩列为执政资源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只有当执政党将经济发展的成果适时地转化为社会的公共福祉，让民众真正合理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之后，这种发展才能被民众所认可和称道，经济业绩在经历这个发酵工程之后才真正转化为执政资源。但如果执政党不能把经济业绩转变为民众的现实福利，而是急功近利，甚至谋一己之私，那么经济发展业绩越突出，社会不公就越突出，社会问题就越多，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就会越低。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业绩不仅不是一种执政资源，反而会成为执政资源流失的“祸根”，从历史上说，我国的隋朝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与民争利，屯富于国，结果造成国富民穷、国强民弱的局面。开凿大运河，从长远来看是一件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但隋王朝不计民力，急功近利，导致百姓民不聊生，其结果是这些经济业绩反而成了加速隋灭亡的催化剂，尽管直到贞观年间，唐朝官员的部分俸禄仍然来自隋朝国库遗产，但一切都已物是人非。而横看当今世界，世纪之交失去执政地位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人民党、印尼专业集团等大党、老党等在执政期间，其经济业绩都可圈可点，便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实例证。因此，经济业绩充其量只是一种可能的潜在性执政资源。

文化资源等同样如此，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和繁荣，民众的精神生活追求得到满足，势必会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民众对执政党的文化业绩认同，并升华为对执政党所推崇的主流价值观的认同，这样，文化资源就转化为了执政党的执政资源。但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与繁荣，必然伴随着各种社会思潮的大交流大碰撞，价值观的多元化势必对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强大冲击，如果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缺乏应有的社会整合力和说服力的话，其结果就是民众社会价值判断的无所适从、道德沦丧、信任危机等社会问题便接踵而来，这时候的文化资源对于统治者而言就不再是一种执政资源了。

关于党的执政资源的现状评估问题：

由于技术性原因，目前这个问题尚难以深入，因为现状评估首先需要确立一个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而这一体系目前并不存在，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的相应评价，其科学性、权威性等都有待考察。目前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